

## 評介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 從下野到復行視事》\*

林桶法\*\*

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年8月初版。344頁。

近百年來，歷史研究一直圍繞著史料與史觀價值的爭論，史料學派，秉持西方史學家蘭克及法國郎格羅（Ch. V. Langlois）的「無史料即無歷史」（no document no history）的精神，不斷從史料上爬梳，希望重建歷史發展的原貌；史觀學派，重視歷史的解釋，甚至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視所有材料只是文本而已，雖否定史料的絕對價值，但也讓歷史研究者更加審慎運用所找到的史料；不論是史觀學派或史料學派，新史料的出現，必定帶動新的研究潮流，對民國史的研究而言，《蔣中正日記》的公開即是其一。

蔣中正（1897-1975）曾參與辛亥革命、領導北伐、抗戰與對抗中共，擔任過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主席、中華民國總統等要職，一生忙碌，毅力過人。自1915年開始寫日記至1972年，幾乎不曾間斷。這證實了蔣氏的話：「尚敢自信者，就是有恆一點」。蔣日記目前除民國13年（1924）遺失外，共55冊，大約450萬字。蔣中正1975年逝世後，日記由蔣經國保存，經國過世後由蔣孝勇保管，後由蔣方智怡於2004年送交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暫存，同時進行整

---

\* 本文承蒙一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0年11月24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年3月4日。

\*\*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理及數位化。2006 年起陸續開放，至 2009 年日記已全部提供學者及民眾參閱。

在蔣中正日記正式開放之前，學者已經長時期使用以日記為底本的相關資料，包括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現存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及秦孝儀主編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等，其中「公曰」、「公自記」，大多錄自蔣氏日記。另外《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的《省克記》、《愛記》、《游記》、《學記》、《困勉記》等五記，為蔣日記的分類類鈔。自蔣日記公開後，引起各方的關切與好奇，更成為歷史學者急欲找尋可能為民國史補正觀點的依據，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遂成為民國史學者取經必到之處。日記開放閱覽後，許多以蔣日記為中心的民國史專書、專文陸續出版，<sup>1</sup> 以蔣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陸續舉辦，<sup>2</sup> 無疑的，學界再掀起民國史及蔣中正研究的新熱潮，要歸功於蔣日記的公開。

過去有關蔣中正的著作已經汗牛充棟，蔣的評價也是兩極化，大陸的著作方面，改革開放之前，大陸基本不存在對蔣中正的學術性研究，中共建國前後用以批判宣傳的小冊數量不小，如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方克的《蔣介石賣國真相》、榮孟源的《國賊蔣介石》等等，多數並無學術價值。改革開放後對蔣的學術方面的研究，在 1985 年前幾乎一片空白。在 1986 年後，有較多的學者試著從學術的眼光來研究蔣中正，如楊樹標的《蔣介石傳》、宋平的《蔣介石生平》，楊天石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蔣檔，於 1988 年在《歷史研究》發表〈中山艦事件之謎〉，極有學術水準。<sup>3</sup>

但整體而言，限於資料，在 1990 年之前有關蔣的研究大體難有突破，從 1990 年後，蔣的研究逐漸有專題化、深化的趨勢，楊天石與楊奎松等學者居功厥偉，楊天石大量參酌蔣的史料，特別是第二歷史檔案館、國史館、黨史館及

<sup>1</sup> 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

<sup>2</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年 9 月 14-16 日；浙江大學主辦，「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浙江：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2010 年 4 月 10-12 日，此會為大陸地區首度以蔣介石為名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主辦，「蔣介石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文化大學史學所，2010 年 8 月 25-26 日；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蔣中正日記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圓山飯店，2010 年 12 月 2-4 日。

<sup>3</sup> 楊奎松，〈大陸蔣介石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浙江：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2010 年 4 月 10-12 日，頁 274-275。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所開放的《蔣中正日記》，一連串寫了一些專書，如《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等系列著作。楊奎松蒐集國、共所典藏的重要史料，從專題的角度分析蔣，如《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sup>4</sup>等。此外陳紅民教授由南京大學轉到浙江大學後，有見於蔣研究的重要性，在浙大成立蔣介石研究中心，帶動一批後起新秀進行蔣的研究，更著重於蔣在臺灣的發展，撰寫《蔣介石的後半生》，<sup>5</sup>這些專書較能從學術的角度對蔣進行剖析。

特別是蔣中正日記開放後，掀起大陸蔣中正評價的高潮，且有許多較專業的研究成果，外交方面，如王建朗、陳謙平，政治方面，如金以林、汪朝光，讀書方面，如王奇生對蔣的閱讀世界相當有興趣，其他專題方面，如黃道炫的〈長征初期蔣介石與粵系〉、江沛的〈蔣介石與張伯苓及南開大學〉等，不勝枚舉。對大陸地區而言，這段期間無疑的是當代研究蔣中正的黃金時期，對蔣的評述亦逐漸擺脫過去意識形態的窠臼。

美國方面，過去 60 年來，雖有一些著作論及蔣中正，然對蔣的評價大多持否定的態度，認為蔣是無能、腐敗、專權的領導者，甚至將失去大陸的責任歸諸於蔣身上，其中以易勞逸（Lloyd Eastman）、費正清（John Fairbank）為代表，這些著作大部分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論述蔣的一生，同情史迪威，苛責蔣介石，對中共的瞭解也極為片面，認為中共是土地的改革者，對蔣所領導的政府並無太多的好感，從最早 50 年代的「失去中國」的檢討，到 70 年代「失去機會」的論述，批判國民政府與蔣成為美國或西方史學界的主流，甚至影響到美國一般人的觀點。最近的論著最為西方所重視的是陶涵（Jay Taylor）的《委員長：蔣介石和現代中國的奮鬥》一書的出版（2009），<sup>6</sup>頗受一些當代史家如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所推崇，最重要的是對蔣重新評價，雖然這樣的評價到底能否改變多少西方人對蔣的看法，不得而知，但至少利用蔣日記的內容來駁斥過去陳述蔣貪污、貪婪、賣國的說法。而且正如呂芳上教授評價認為：「本書對蔣一生的評價正面多於負面、功大於過、譽多於毀，對臺灣學界而言，有些論述或有似曾相識、老調重彈之感，但放在西方學界或中國大陸觀點下，

<sup>4</sup>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sup>5</sup> 陳紅民，《蔣介石的後半生》（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

<sup>6</sup>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這絕對是一本翻案性很強、適時重評蔣介石的巨著。」<sup>7</sup>

臺灣方面，1980 年代以前蔣的相關論著雖不少，但大多是回憶與史料的彙編，如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先總統蔣公有關論述與史料》（1979）<sup>8</sup>、秦孝儀，《先總統蔣公嘉言總輯》（1981）<sup>9</sup>、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78）<sup>10</sup> 等，此外有許多的討論會，如「抗戰建國史討論會」（近史所）、「北伐統一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中華民國史專題學術研討會」（國史館）等等，有零星的專文討論蔣，有些學者亦試圖評價蔣中正，如黃仁宇在其《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sup>11</sup>、許倬雲，〈試論先總統蔣公的歷史評價〉<sup>12</sup>，吳相湘，〈北伐七十周年論蔣中正的歷史成就〉<sup>13</sup>，呂士朋，〈蔣中正先生的忠貞氣節與革命薪傳〉<sup>14</sup>，李敖，《蔣介石研究》<sup>15</sup>，李敖、汪榮祖著，《蔣介石評傳》<sup>16</sup>，胡春惠，〈總統蔣公與中國民主憲政〉<sup>17</sup> 等不勝枚舉。亦有學者對蔣在民國史的地位作綜合論述，如張玉法，〈民國歷任元首的性格特質〉，強調：「長年作為國家元首，蔣介石的性格是突出的。」<sup>18</sup> 呂芳上，〈領導者心路歷程的探索：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對於蔣對付非嫡系的態度提到：「作為同一時代的權力競逐者，從北伐以後可以看到蔣對群雄所採取的策略，是兼採策反與撻伐的政策，過去很長時期有不少人知道蔣對不同軍系的處理方法，有使用金錢籠

<sup>7</sup> 呂芳上，〈重評蔣介石〉，《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臺北：時報出版社），頁 11。

<sup>8</sup>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先總統蔣公有關論述與史料》（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9 年）。

<sup>9</sup> 秦孝儀，《先總統蔣公嘉言總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

<sup>10</sup>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 年）。

<sup>11</sup> 黃仁宇，《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1994 年）。

<sup>12</sup> 許倬雲，〈試論先總統蔣公的歷史評價〉，《革命思想》，第 78 卷 5 期（1995 年 7 月），頁 5-13。

<sup>13</sup> 吳相湘，〈北伐七十周年論蔣中正的歷史成就〉，《傳記文學》，第 69 卷 1 期（1996 年 7 月），頁 28-29。

<sup>14</sup> 呂士朋，〈蔣中正先生的忠貞氣節與革命薪傳〉，《近代中國》，第 82 期（1991 年 4 月），頁 80-95。

<sup>15</sup> 李敖，《蔣介石研究》（臺北：榮泉文化，1995-1999 年）。

<sup>16</sup> 李敖、汪榮祖著，《蔣介石評傳》（臺北：商周文化，1995 年）。

<sup>17</sup> 胡春惠，〈總統蔣公與中國民主憲政〉，《近代中國》，第 5 期（1978 年 3 月），頁 45-55。

<sup>18</sup> 張玉法，〈民國歷任元首的性格特質〉，《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臺北：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5。

絡，有使用武力平息。」<sup>19</sup> 這些都是相當精闢的評論。

整體而言對蔣的評述，由於長期以來臺灣保存許多國民黨及蔣的相關史料，臺灣的歷史研究特別是民國史的研究大多承續史料學派的傳統，重視史料的運用，研究的課題相當廣泛，從政治、軍事、思想、文化，甚至蔣個人的評價或與孫中山領導風格等的專著都有。對蔣在大陸時期特別是北伐、抗戰的表現都給予肯定。隨著政治解嚴，特別是政黨輪替後，對蔣批判的論著愈來愈多，對臺灣民主化的過程及戒嚴時期的許多政治事件，都給予批判。

隨著蔣中正日記的公開，臺灣也有許多學者前往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資料，如呂芳上、王成勉、張力、黃自進、陳立文、林桶法等，另外長期接觸黨史資料的邵銘煌等，相繼發表許多的專文，這些專文的層面雖廣，但在觀點上嚴格說來，只是史料的補充及更細膩的評述而已，顛覆過去意見的著作較少。臺灣早期民國史的研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史會、國史館等單位的推動下，有許多的史學前輩如李國祁、蔣永敬、李雲漢、張朋園、呂實強、李守孔、張玉法、呂芳上等人的教育下，有一些中生代的學者，逐漸嶄露頭角，其中最為大家所肯定的即為劉維開教授。

劉教授係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受業於黃季陸、蔣永敬、李雲漢等名師，曾在國民黨黨史會工作，有機會閱讀到大量的黨史資料，並是較早閱讀過蔣中正日記的學者之一，其著作相當多，大部分都集中在民國政治、軍事方面，如《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sup>20</sup>、《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至七七》<sup>21</sup> 等專著，並有幾十篇的專文，對蔣中正的研究著力甚深，如〈蔣中正西安半月記研究〉<sup>22</sup>、〈中日和約簽訂的經過——以蔣總統為中心的探討〉<sup>23</sup>、〈蔣中正第三次下野之研究〉<sup>24</sup> 等，這本《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

<sup>19</sup> 呂芳上，〈領導者心路歷程的探索：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臺北：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82。

<sup>20</sup> 劉維開，《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臺北：商務印書館，1989年）。

<sup>21</sup>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至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年）。

<sup>22</sup> 劉維開，〈蔣中正西安半月記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0期（2003年5月），頁345-373。

<sup>23</sup> 劉維開，〈中日和約簽訂的經過——以蔣總統為中心的探討〉，《近代中國》，第148期（2002年4月），頁28-39。

<sup>24</sup> 劉維開，〈蔣中正第三次下野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7期（2000

行視事》即是其中之一。

本書正如作者所言：「以蔣中正的一九四九為題，不準備對蔣中正在一九四九年的各項作為進行研究，而是將重點置於蔣中正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下野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復行視事一年多的時間中，探討他如何再起，再起的過程與機遇。」（頁 9）本書除前言、結論外，計分為五章：第一章第三次下野，敘述蔣氏下野的原因，以及下野之經過；第二章從溪口到臺北，敘述蔣氏下野後居留溪口的生活，以及轉赴上海、舟山、臺灣等地的過程；第三章建立黨政關係常軌，分析蔣在杭州會談、成立非常委員會，以及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等事件中的地位；第四章維護大陸最後據點，探討蔣氏兩度至西南的情形，以及其在李宗仁出國後，角色如何轉換，從幕後走上前臺；第五章在臺復行視事，探討蔣個人對於復任總統問題的認知，以及復職一事進行的經過。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引述資料豐富而多元，作者大量的參考目前典藏於臺灣國史館的相關檔案，特別是《蔣中正總統檔案》，與黨史館典藏的《總裁檔案》、《會議記錄》等資料，也運用一些個人的日記，如徐永昌、王世杰、張群、吳忠信、居正、閻錫山等，更參閱一些相關人物的來往書信與回憶錄，如李宗仁、張發奎、程思遠等，也參閱當時的報紙資料，在史料的運用上亦相當嫻熟。

其次論述事情的原委相當清楚，如第一章第三次下野，從桂系的逼宮，蔣的決定，下野的折衝準備等脈絡清晰，使讀者能掌控所述主題的重點。另對所探索之主題，亦有分析，如第三章建立黨政關係常軌，主要介紹杭州會談的經過與決定，蔣之所以能在下野後仍在幕後掌控黨政軍大局，主要的原因來自蔣仍具國民黨總裁的身分，而杭州會談則賦予黨相當大的權力。作者在書中駁斥李宗仁認為會談的目的只是為了安排蔣氏重新掌握權力而已，並否認有所謂會議的決議，認為只是一個見面談話而已。<sup>25</sup> 作者陳述會議的經過與設置非常委員會等的決議，駁斥李氏的論點。第二章從溪口到臺北，提到蔣宋美齡最先不贊成蔣回溪口，最主要是安全的考量（頁 74-75）。又提到來臺之前，前往督導舟山的原因之一為使該地作為上海物資及駐防國軍撤退的中間站（頁 142），甚有見地。

本書亦能精準的掌握蔣中正與相關的重要人物間的互動關係，如蔣下野前

---

年 6 月)，頁 131-156。

<sup>25</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冊（臺中：永蓮清出版社，1986 年），頁 631。

如何透過親信吳忠信、張群等與李宗仁折衝到底是代行、繼承的問題。又如蔣要復行視事前，又與吳忠信、徐永昌、王寵惠、閻錫山等商議，顧到法律與現實的問題。此外對於人事的安排亦都有全面的考量，如閻錫山擔任院長的問題，不僅考慮李宗仁的意見，也考慮到國防部長等職位的連動性（頁 94）。從作者的敘述中可以瞭解蔣並非外界所認為是衝動魯莽的躁進者，而是城府甚深的決策者。

本書雖讓讀者瞭解蔣為何下野，又為何轉到臺灣，甚至復行視事，作者也不擬全面的探索 1949 年的問題，但仍有一些與蔣相關的課題，應該補充會更為紮實，如國際外交方面，蔣的下野既有美國的因素，不論是司徒雷登，或者傅涇波，當然多少有美國當局的期許在內，這方面美國檔案及外交部的檔案已公布，似應強化。美國於 1949 年 8 月 5 日發表的「對華白皮書」，是使國內政局更加惡化的重要原因，蔣在日記及事後的許多演說對美國的批判相當多。而蔣至臺灣後，對於開展外交不遺餘力，前後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訪問菲律賓與韓國，企圖開拓遠東外交的新局面，雖成效有限，但也是蔣下野後的重大事蹟，因此建議如進行修改，似可以外交部檔案及顧維鈞回憶錄等著手補強，應有一章專門探索蔣與國際關係。

蔣下野後是否干政與指導軍事發展，為人所詬病，除李宗仁之外，國軍的將領陳誠、湯恩伯甚至周至柔都有此指責，書中雖有部分提及，但應有一節或一章處理此問題。另外有許多人所關注的課題，如釋放張學良的問題，李宗仁代行總統期間曾派人至臺灣探詢釋放張學良，最後毫無結果，其間的關鍵在蔣。另外蔣宋美齡曾建議蔣到加拿大，為何是到加拿大而非到美國，其原因為何。

書中論述有部分引述資料，未進一步探索者，如引吳忠信日記，談到吳與蔣見面談及蔣可以出洋一事（頁 100）。蔣決定下野並無問題，但對於逼其出國，其態度始終不贊成，此處吳忠信所談到底是蔣的想法，還是吳的誤解。另外對於蔣下野的時間，為何是在 1 月 21 日，其中與三大戰役國軍失敗已成定局有關，如 1949 年 1 月 10 日的日記中提到：「我黃河以南地區之主力今已被殲，則兵力更形懸如，但已盡我心力，無可愧對我將士，而將領無能至此，實為我教育不良，監督無方之咎，愧悔無地自容。一時之刺激悲哀難以自制，但今後下野可以無遺憾矣。前之所以不為桂系強逼下野者，惟此杜部待援，戰責未盡

爾。」<sup>26</sup> 這種關鍵點的論述仍可加強。

此外從書中對蔣的論述，看似每件事情都在其運籌帷幄之中，蔣下野後，時局對國民黨仍非不可作為，為何又導致節節敗退，是其不願全心輔佐李宗仁，企圖將失敗之責推於李，以便趁勢再起，還是有其他的因素，作者曾為文檢討 1949 年失敗的原因，<sup>27</sup> 應於本文中加以探討，較能瞭解蔣所犯的錯誤為何。

英國史家卡爾（Edward H. Carr, 1892-1982）曾說：歷史是歷史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終止的對話。<sup>28</sup> 劉維開教授的這本大作，嫻熟地運用相關的史料，特別是一些往來書信、日記等，對每一環節作細膩地探索，使讀者瞭解蔣為何下野，如何復行視事。也能掌握其精髓，以蔣中正復職意義而言，作者提到：蔣氏復行視事，對在風雨飄搖中的臺灣，雖然情勢並未因此而穩定，但國家領導有人，對於政府的作為，民心士氣的激勵，均有積極的作用（頁 327）。這些確實對讀者有許多的啟發。

---

<sup>26</sup>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蔣中正日記》，1949 年 1 月 10 日。

<sup>27</sup> 劉維開，〈蔣中正對 1949 年失敗的檢討——以演講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9 期（2008 年 5 月），頁 85-125。

<sup>28</sup> Edward 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1 年），頁 23。